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作品选编

■编者按 日前，第十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名单正式公布。为加大对优秀获奖成果的宣传推介和转化利用力度，切实推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羊城晚报理论版今日推出专版，选取第十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论文类部分作品精要进行集中宣介，在展现广东学人担当、演绎广东学界精彩的同时，亦供大家学习交流借鉴。

网络民意声声入耳 政策回应步步到位

共筑互联网时代“中国之治”新蓝图

□陈贵梧 林晓虹

当前，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社会互动、秩序乃至范式的根本性改变。随着公民意识的增强，日益壮大的网民自然会寻求或创造表达呼声的出口，而新媒体无疑成为公共舆论的助推器、发酵器与演绎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成为党和政府“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也就是说，党的群众路线在互联网时代的具体表现就是党和政府对网络民意的重视与回应。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创造了新的基础结构，成为了公众表达诉求、形成舆论进而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力量。

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既是时代性的命题，也是一个凸显中国制度特性的命题

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媒体主导的信息传播秩序，它能将所有关注某一话题的公众聚集在一起，通过阅读、评论、转发、点赞等方式表达偏好，而且将碎片化的信息联系起来形成网状结构，帮助公众构建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图谱，让民众的意见和诉求表达，具备了力量聚集、偏好显示、信息筛选和全局扩散的特点。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集中反映了整体国民情绪的变化。然而，新媒体的技术属性推动信息自由流动和某种程度的社会偏好显示是一回事，民众在新媒体上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得以形成公共舆论，并能够影响政府议程设置和公共政策过程则是另一回事。在根本上，后者取决于国家（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制度框架。因此，我们可以说，基于新媒体的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既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凸显中国制度特性的命题。

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相互牵制的制度环境下，公共政策过程呈现出显著的“有组织地无序”特征，问题、政治与政策相对独立、各行其是的程度较为明显。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控制所有的政策过程，公共舆论难以出现一面倒的现象，其所产生的压力也是很分散的，对公共政策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公共舆论能否推动某些问题进入政府议程，关键在于这些问题能否被民选政治家所接受。与促进议程设置的积极作用相比，公共舆论有时会呈现消极影响，譬如，试图干扰或者限制政府的行动，阻止政府做某些事情。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制度具有政治与行政辩证统一的显著特征，产生了政治引领行政、统筹行政和融通行政的治理功能。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主导着公共政策过程。这并非说中国不存在政策企业家的角色，而是说，政策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策企业家更多的是作为政策创新者和备选方案的提供者而出现，并不是像多源流理论原型设定那样撮合问题、政治与政策三源流或者推动议程设置。另一方面，执政党历来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走的是“群众路线”，这体现在政策制定上就是回应社会关切，“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共享出行的安全保障和监管就是这样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识别哪些问题应该引起政治层面的关注，并寻求解决方案变得至关重要。显然，网络舆论提供了一种反映治理问题、显示社会偏好的重要方式，也就成为了民众通过“集体发声”推动议程设置的有效替代性渠道。

问题、政治与政策的耦合

网络舆论如何形塑我们的政策议程？

近年来，由网络舆论推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例子不胜枚举。通过梳理顺风车安全管理政策变革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政策议程是由问题触发的，但是问题本身可能还不足以推动这个过程，而是有赖于网络公共舆论的推动，关键在于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的汇合。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舆论和政府政策议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内生于当前的制度环境、民众情绪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回应性策略。网络舆论内生于问题、政治与政策，同时又塑造着这三者的关系和互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建立在三者耦合基础上的公共政策。这是一个多种因素耦合与动态演化过程。

与其他共享经济业态不同，公共安全（乘客安全）是顺风车业务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第一，对于乘客而言，自我防范、安全保护意识不强，特别是受到顺风车比出租车更安全的认知，以及企业对合乘的社交功能的引导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能对合乘安全问题掉以轻心。第二，对于企业而言，存在着安全投入和风险成本之间的权衡取舍。乘客安全的保障不仅需要确保企业采取注册验证、背景筛查、接单前人脸识别、人车相符等常规安全措施，也需要提供夜间安全保障机制——不仅需要提高潜在风险识别、用户投诉的及时受理能力，更需要提高与用户体量增大后相匹配的安全管理和风险处置能力。这些安全措施对企业而言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社会责任履行问题，而是高额的投入成本，它取决于给定的法律制度、规制要求、企业的定位和经营策略，以及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等众多因素。第三，对于政府而言，共享出行安全监管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政策问题。这不仅仅表现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白和滞后，更关键的是一些根本性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和界定：比如顺风车平台与车主、乘客之间是怎样的法律关系？三者之间的责任如何界定和划分？在即使依法合规经营与技术创新条件下，也无法绝对避免安全事故发生，那么什么才是社会有效水平上的安全标准，安全的底线究竟在哪里？平台是否具有、是否应该承担安全的连带责任，以及如何落实安全责任？政府又如何实施监管？如何才能守住安全的底线？诸如此类的问题还缺乏共识。在给定既定权责范围、有限资源和有限注意力的情况下，单个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等等看”的治理态度，而不轻易去触碰这些棘手问题，除非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压力或者社会压力。

直到2018年“5·6空姐遇害事件”和“8·24乐清女孩遇害事件”两个偶然的命案接连发生，顺风车安全出行问题才引起了有关各方高度关注。由于前期缺乏实质性回应，紧挨着的两起危机事件引发网络舆论的升级，促使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从轻度耦合演变为高度耦合，进而促使“问题之窗”与“政治之窗”相继开启，最终导致顺风车安全管理政策由宽松到严苛的巨大转变。如果说，前者只是打开“问题之窗”，引起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共享出行安全问题的重点关注，那么后者则是完全打开了“政治之窗”，导致政府部门要求全国范围内的顺风车业务停业整治，并陆续出台或完善规制政策。这对于促进顺风车业务、网约车行业的稳定发展和长期健康运营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仍处于治理转型时期，政府、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众多，而且问题频发，公共政策领域的制度框架和议程设置机制尚处于摸索、调试和形成之中，议程设置的核心在于如何能够回应问题，以缓解社会压力。如果在面临所出现的问题时，利益相关主体未能采取恰当、及时、到位的回应策略和行为，或者回应策略和措施不足以解决紧迫的问题，则可能会衍生后续事件，致使民众采取扩大化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加剧行政和政治压力，进而推动“政治之窗”的打开，通过政治资源和力量设置政策议程，以解决问题。

超越网络情绪

寻求公共治理的理性建构之路

现实中，网络舆论俨然成为了一股影响议程设置、形塑公共政策的力量，显然这种情形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会继续，因而我们需要重视对网络民意的实质性回应。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网民情绪、公共愤怒就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决定性力量。公共政策需要基于真实民意的权衡取舍，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社会化媒体都有自身的媒介逻辑，未必能呈现绝对中立、揭示全面偏好的意见表达，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中焦虑、怨恨驱使下的情绪宣泄更不能代表真实民意。如果这种议程设置模式成为一种常态，不管是对法治意义上的实质正义或程序正义，还是道义意义上的合情合理而言，都意味着某种风险，而且将会使社会治理陷入困境。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当警惕出自本能的民粹主义式社会反应及其引致的无组织、非理性的“借题发挥”式的网络舆论，并对网络舆论予以正确的引导，以使“无组织的无序”向“无组织的有序”转化，达到理性治理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制度安排与治理机制上，需要厘清民众寻求自治的公共权力基础，明确社会自治的私人领域边界，完善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化渠道，推动国家、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实现。

■ 作者简介

陈贵梧，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生态环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林晓虹，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现任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科员

注：本文系第十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作品《网络舆论是如何形塑公共政策的？一个“两阶段多源流”理论框架——以顺风车安全管理政策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21年第2期）的精简改写版

广东音乐在天津早期传播史料辑考

□刘瑾（作者是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

广东音乐，地方性乐种，但在很多地域有着广泛的流传：北京、上海、天津、香港、澳门，乃至海外。其中，广东音乐在天津的传播尤为令人瞩目，天津也因此被称为广东音乐的“第二故乡”。目前，对于广东音乐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然而，通过对广东音乐在津早期传播史料的深入解读，笔者发现，仍然有些许史实需要考证乃至勘误，也有诸如旅津广东音乐会成员名单、社会各界的文艺演出节目单等史料，有助于我们在更加广阔的视域中观察广东音乐在天津早期流传的特征与意义。

旅津广东人与旅津广东音乐会

19世纪下半叶，天津作为重要的漕运商埠已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批商人，其中广东人与福建人都有着相当的规模。旅津广东音乐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成立，然而，关于其成立的时间，史料的记载值得再予考证。

自1931年的《天津志略（会社篇）》记载为1915年之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等各类资料汇编以及研究性文论中均沿用了1915年这一时间。但笔者找到了三个可以说明其成立时间为1914年（民国三年）而非1915年的证据：

第一，天津市档案馆所藏《旅津广东音乐会章程》。其中第一章《总则》第三条明确记载了该组织成立的时间为民国三年（即1914年）。

第二，《北洋画报》1929年（民国十八年）10月12日的383期为“旅津广东音乐会十五周年纪念演剧专号”。由1929年为15周年来推算，旅津广东音乐会的成立时间也应当是1914年，而不是1915年。

第三，《为据旅津广东音乐会主办慰劳国军筹款游艺会呈以演剧筹款慰劳国军请于备案等情呈报》记载了“旅津广东音乐会于民国三年（1914年）主办慰劳国军筹款游艺会，并获教育部颁发的捐资兴学奖状”的情况。既然以“旅津广东音乐会”的名义所举行的筹款游艺会是在1914年，那么该组织便不可能时至1915年才成立。

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会员情况

早期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均为广东籍人士。天津市档案馆所藏1946年的《天津市旅津广东音乐会职员履历表》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职员构成情况：包括理事长1名、常务理事长4名、理事10名、候补理事5名、常务监事1名、监事4名、候补监事2名。年龄从25-45岁不等。所有职员的籍贯均为广东，职业或是从商，或供职于海关、铁路、矿务、银行等。

虽然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从理事长到候补监事均为广东籍，但该组织的会员却已经突破了广东籍的范围。1946年的《旅津广东音乐会会员名册》中记载了109名会员的情况，其中有7名非广东籍的会员，籍贯分别为福建、浙江、天津，入会时间为20世纪30-40年代。

旅津广东音乐会出现了福建与浙江籍的会员，可见广东音乐已经得到非广东人士的喜爱，而20世纪40年代3位天津籍爱好者的加入，或可映射出广东音乐已悄然进入天津人的生活，这为广东音乐在天津的广泛传播埋下了伏笔。

天津人组建的广东音乐社

20世纪40年代，广东音乐在天津蔚然成风，由天津人组建的专门演奏广东音乐的乐社纷纷成立，学校内外、街道家庭中，时常可以听到广东音乐的曼妙旋律。

当时，学生群体是传播广东音乐的中坚力量，许多广东音乐社是由在校学生组建而成。成立于1942年的“南风粤乐社”是众多广东音乐社团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该乐社主要成员有工商学院附中的徐仁、徐杰、韩世珍、董光尧（董坚）、杨浩川、杨少苍，第二中学的赵金铸、陈嘉瑞等人。由于这个乐社演奏水平较高，曲目较多，乐器配备比较齐全，成为当时唯一经常到电台演播广东音乐的团体。“南风粤乐社”的主创者徐仁老先生于1949年组建“天津中国音乐研究会”（现为天津群艺民族乐团），并借助该平台，演奏了170余首广东音乐，参加广东音乐演出250余场。

天津人的积极参与，使得广东音乐的在津继续传播成为可能。即使后来广东人纷纷离津返粤，广东音乐也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在天津的乐友们浇灌与哺育下，广东音乐在天津绽放出了生命的力量。

天津各类表演活动中的广东音乐

鸦片战争之后，大规模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推动了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是加速了西乐东渐的进程。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北京条约》中增开的商埠，天津不仅逐渐成为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同时也成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并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都市。

天津这样一座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城市，其音乐领域又是怎样的情形呢？西方音乐文化是否会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呢？广东音乐作为发轫于珠三角地区的地方性乐种，是否会在天津的整体音乐文化生活中完全被边缘化呢？通过对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的两份节目单的分析，笔者有些意外地发现——

天津市档案馆所藏《为经过情形报出席世界学生日纪念会等事致本局郝局长的呈（附告学生书节目单）》显示，1946年11月17日下午，世界学生日纪念大会在天津市耀华中学校礼堂举行。节目中的第4首作品为广东音乐。如果说，在旅津广东音乐会的演出中，广东音乐一定会成为必然选择的话，那么在“世界学生日纪念大会”也出现广东音乐的身影，则可见广东音乐在天津多元音乐文化语境中的重要地位。

无独有偶，天津市档案馆所藏《为送招待券及节目事致市参会的函（附节目单）》中也出现了广东音乐。1948年9月2日，天津市各界庆祝胜利三周年纪念大会，当晚游艺晚会的第5个节目为南风国乐社演奏的4首国乐（广东音乐曾一度被视为国乐）：《胜利》《甜蜜的苹果》《娱乐升平》《狂欢》。

从以上两次活动的节目安排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天津有着多元包容的音乐文化氛围，而被视为国乐的广东音乐，在西乐东渐的文化背景中，显然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结语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与分析，广东音乐在天津早期传播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其特征与意义也随之显现。

首先，广东音乐经历了由广东人传入，后转而由大批天津人参与的变化过程。从广东人成立的旅津广东音乐会，到天津人组建大量广东音乐社团，并形成传播热潮，广东音乐得以融入天津人的音乐生活之中，展现出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同血同脉的内在机理。

此外，广东音乐在天津的传入直至传播热潮的形成，正处于西乐东渐、新文化运动以及新音乐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之中，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乐种之一，广东音乐非但没有因为西方音乐的传入而式微，反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不仅是地方性乐种异地传播的一个生动案例，更是中国传统音乐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有力佐证。

信息技术驱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

——美的智能制造跨越式战略变革纵向案例研究

□肖静华 吴小龙 谢康 吴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2023年9月，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这为我国工业和信息化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型工业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是制造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前，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正处于竞争格局未定的战略窗口期，智能制造成为世界大国和经济强国竞争的主战场，也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方向，为中国制造加速追赶发达国家高端制造提供了契机。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制造分流形成的“双向挤压”，使中国制造面临高端受阻与低端外流的困境；另一方面，制造基础能力不足、数字化水平较低等劣势，使中国制造升级面临“不转等死，转不好找死”的风险。在此情形下，如何突破困境，实现从大规模制造到智能制造的跨越式战略变革，既是中国企业亟待解决的实践难题，也是企业战略变革研究需要探讨的理论议题。

在理论分析方面，组织管理领域提出组织学习是企业利用资源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方式，为探讨企业实现战略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分析信息技术对利用式和探索式学习的影响，尚未关注企业跨越式战略变革的情况。在这一情境下，信息技术如何作用于组织学习，助力企业实现跨越，还有待探讨；技术范式变革领域则聚焦智能制造带来的发展机会窗口分析，提出智能制造以其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特征，不仅颠覆了传统制造方式，而且催生了商业模式和战略形态的创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在推动面向智能制造的技术范式变革。发达国家制造企业从大规模制造到智能制造经历长期渐进发展，对旧模式形成持续替代。与之相比，由于中国工业化发展起步晚、基础弱，中国制造企业从大规模制造到智能制造的技术范式变革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因此，对于中国制造企业而言，要想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必须把握技术变革带来的跨越机遇。技术范式的转变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了一个学习的窗口和赶超的机会，然而，对于企业如何利用技术范式的转变实现跨越式战略变革，现有战略变革的文献还未给出充分的理论解释。

本文研究遵循“转型前→转型过程→转型后”的企业战略转型过程。首先，对转型前的企业运营特征进行分析。其次，通过分析信息技术对企业组织管理的影响，从组织学习视角探讨企业的转型过程。组织学习是企业适应环境的重要方式，通过加强组织学习，企业能够有效进行战略变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组织学习的方式，拓展学习的渠道，强化企业通过数据形成知识的能力，促进企业洞察技术前沿，使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在本成果中，考察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信息技术对组织学习的影响过程，提炼出企业跨越式转型过程中的组织学习机制，讨论通过信息技术应用影响组织学习方式，实现企业的能力跨越和体系跨越。最后，探讨转型后的企业运营特征，由此提出企业实现能力跨越和体系跨越的理论框架。

据此，本文通过对美的集团的转型案例分析，提炼出扎根于中国实践的企业跨越式变革理论框架，具体形成两点研究发现：1.数字化补课和智能化创新构成中国企业从大规模制造到智能制造跨越式战略变革的两个关键阶段，前一阶段主要通过数字化加速学习机制，促进企业组织学习效率，实现从粗放式管理到数字化管理的能力跨越，后一阶段主要通过数字化重构学习机制，实现从工业化到智能化的体系跨越；2.通过信息技术驱动双重跨越的战略变革，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据此，推进对跨越式战略变革的理解，形成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深化。

本成果的学术影响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创新性地提出“双跨越”转型理论，为制造企业的转型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为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路径提供新思路。智能制造呈现出与以往技术范式不同的两个特征：首先，智能制造是智能技术与业务高度匹配的制造模式，是技术与管理深度融合的产物；其次，智能制造尚处于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企业均处于探索之中，尚未形成成熟的技术范式。因此，本文构建双跨越转型理论，提出中国企业在面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中，一方面，需要快速弥补管理基础薄弱的短板，实现从粗放式管理到数字化管理的能力跨越，使管理能力与智能制造技术相匹配；另一方面，实现从工业化到智能化的体系跨越，从而能与发达国家企业同步创新。据此，提炼出智能制造跨越式战略变革的过程机制，为智能制造这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课题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升级路径研究提供理论指引。

二是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跨越式战略变革的底层逻辑，推动战略和组织行为领域针对战略变革与组织学习的理论融合。战略变革的研究指出，通过组织学习提升能力是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重要路径。其中，信息技术改变了以经验为主的组织学习方式，不仅能提升利用式学习的效率，也能降低探索式学习的成本，在驱动企业的战略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对于在企业进行跨越式战略变革的情境下，信息技术影响组织学习、助力企业实现跨越的机制，还鲜有探讨。基于此，本文提出企业跨越式战略变革情境下的组织学习机制，一方面通过数字化加速学习机制，促进企业组织学习效率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重构学习机制，实现组织的学习方式重塑，适应企业智能制造变革需求。该研究成果通过理论构建推动战略和组织行为领域针对战略变革与组织学习的理论前沿，也为研究数字化时代企业转型提供必要的理论启示和指导。

三是扎根中国实践，研究中国问题，呼应国家转型升级战略，聚焦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探讨和推进数智时代制造企业转型的学术前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作为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关乎我国未来制造业的全球地位，对于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智能制造可以带动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工业软件等新兴产业发展，本身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够培育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智能制造能够融入千行百业，通过重构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等诸多环节，对传统制造业产生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有力助推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中提质增效、焕发生机。本成果紧密结合数字时代下最新行业企业实践，聚焦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启发和鼓励相关领域学者关注数智时代制造企业转型的前沿理论问题。

工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也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数字化转型是世界经济大势所趋，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研究亟待持续探索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何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企业形态实现根本性变革，从而揭示在不断形成与培育新质生产力进程中，制造企业发展变革的规律，为新型工业化全方位赋能。

■ 作者简介

肖静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吴小龙，中山大学商学院助理研究员

谢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吴瑶，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第十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作品《信息技术驱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美的智能制造跨越式战略变革纵向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3期）的精简改写版